

欧率更帖

【原文】

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，载欧阳率更一帖云：“年二十馀，至鄱阳，地沃土平，饮食丰贱，众士往往凑聚。每日赏华，恣口所须。其二张才华议论，一时俊杰；殷、薛二侯，故不可言；戴君国士，出言便是月旦；萧中郎颇纵放诞，亦有雅致；彭君摘藻，特有自然，至如《阁山神诗》，先辈亦不能加。此数子遂无一在，殊使痛心。”兹盖吾乡故实也。

【译文】

在临川县的一处石刻中有一卷法帖，此法帖中刊载了欧阳询（曾任太子率更令）的一份字帖，帖上说：“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到了鄱阳，这里土地肥沃平坦，饮食既丰富又便宜，许多读书人时常聚在一起，每天赏花饮酒，大饱口福。其中有两个张姓人氏才华横溢，满腹经纶，实是一时不可多得的人才；姓殷、薛的两位士人，自不必说；戴君也是杰出的人才，每有评说，一发言就成定论；

萧中郎稍稍显得放纵狂妄，但是有文雅的风度；彭先生辞藻秀丽，文章十分自然，至于像《阁山神诗》，就是先辈名人也不能超过他。这些名士已经无一人在了，特别使人痛心。”所有这些，都是我们乡里值得称道的旧事呀！



罗处士志

【原文】

襄阳有隋《处士罗君墓志》曰：“君讳靖，字礼，襄阳广昌人。高祖长卿，齐饶州刺史。曾祖弘智，梁殿中将军。祖养，父靖，学优不仕，有名当代。”碑字画劲楷，类褚河南，然父子皆名靖，为不可晓。拓跋魏安同父名屈，同之长子亦名屈，祖孙同名，胡人无足言者，但罗君不应尔也。

【译文】

襄阳（今湖北襄樊市）有隋时《处士罗君墓志》，志文说：“罗君名靖，字礼，襄阳广昌县（今湖北枣阳县）人。高祖长卿，南朝齐饶州刺史。曾祖弘智，南朝梁殿中将军。祖父养，父亲靖，学问都很好，没有做官，当时很有名望。”碑文刚劲有力，很像河南褚遂良。然而父子都名靖，却让人不理解。拓跋魏的安同，父亲名屈，安同的长子也名屈，祖父与孙子同名，对于胡人是无所谓的，但对于罗君却不应该如此。

唐平蛮碑

【原文】

成都有唐《平南蛮碑》，开元十九年，剑南节度副使张敬忠所立。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，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，拔其九城。此事《新、旧

唐书》及野史皆不载。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。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，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，不知明皇用守信，盖有以启之也。裴光庭、萧嵩时为相，无足责者。杨氏苗裔，至今犹连“晟”字云。

【译文】

成都有唐朝的《平南蛮碑》，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73年），剑南节度副使张敬所立下的。当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扰乱边疆引起祸乱，唐明皇派内常侍高守信任南道招慰处置使去讨伐他，攻下了九座城池。而这件事情在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及野史中都没有记载。唐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，唐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。议论者都讽刺他们用宦官掌握兵权，不知道这其实是唐明皇任用高守信，才开启了这样的先例。裴光庭、萧嵩，当时为丞相，不足以责备他们。杨氏苗族后裔，直到现在，名字上都还连着“晟”字呢！

禹治水

【原文】

《禹贡》叙治水，以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为次。考地理言之，豫居九州中，与兖、徐接境，何为自徐之扬，顾以豫为后乎？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。冀为帝都，既在所先，而地居北方，实于五行为水，水生木，木东方也。故次之以兖、青、徐；木生火，火南方也，故次之以扬、荆；火生土，土中央也，故次之以豫；土生金，金西方也，故终于梁、雍。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，与鲧之

汨陈五行相去远矣。此说予得之魏几道。

【译文】

《禹贡》记叙大禹治水，其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为先后次序。按地理来说，豫州在九州中间，和兖州、徐州相接，为什么却从徐州写到扬州，反把豫州丢下了呢？大概是因为禹以五行而治理的缘故吧。冀州是帝都，应该在先，而且地理位置又在北方，按五行属水，水能生木，木是东方。所以按次序是兖州、青州、徐州；木能生火，火是南方，所以依次是扬州、荊州；火能生土，土是中央，所以豫州是再下来了；土能生金，金是西方，所以最后是梁州、雍州。这就是《尚书·洪范》所说的常理都有了序列。和鲧乱列五行，是相距很远的。这个说法，我是从魏几道那里得来的。



敕勒歌

【原文】

鲁直题《阳关图》诗云：“想得阳关更西路，北风低草见牛羊。”又集中有《书韦深道诸帖》云：“斛律明月，胡儿也，不以文章显。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，召明月作歌以排闷，仓促之间，语奇壮如此，盖率意道事实耳。”予按《古乐府》有《敕勒歌》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，悲愤疾发，使斛律金唱《敕勒》，欢自和之。其歌本鲜卑语，词曰：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

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，盖此也。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，明月名光，金之子也。欢败于玉壁，亦非困于敕勒川。

【译文】

黄鲁直在《阳关图》中诗说：“想得阳关更西路，北风低草见牛羊。”又集中有《书韦深道诸帖》说：“斛律明月，本是胡人，文章并不出名，老胡高欢因大批军队被困在敕勒川，便召斛律明月唱歌解闷，在他仓促之间，唱词却极为奇壮无比，大概是因随意写事实的缘故吧！”我查《古乐府》有《敕勒歌》，认为是北齐高欢攻打北周的玉壁（今山西稷山县西南）失败，愤恨疾发，生了病，让斛律金唱《敕勒歌》，高欢亲自和乐。歌词本是鲜卑语，歌词说：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黄鲁直题的《阳关图》和诗中所引用的，大概来源于此。但却把斛律金误成斛律明月。明月名叫光，是斛律金的儿子。高欢是败在了玉壁，也不是被困在敕勒川。

地险

【原文】

古今言地险者，以谓函秦宅关、河之胜，齐负海、岱，赵、魏据大河，晋表里河山，蜀有剑门、瞿塘之阻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，吴长江万里，兼五湖之固，皆足以立国。惟宋、卫之郊，四通八达，无一险可恃。然东汉之末，袁绍跨有青、冀、幽、并四州，韩遂、马腾辈分据关中，刘璋擅蜀，刘表居

荆州，吕布盗徐，袁术包南阳、寿春，孙策取江东，天下形胜尽矣。曹操晚得兖州，倔强其间，终之夷群雄，覆汉祚。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，故能成功。而唐僖、昭之时，方镇擅地，王氏有赵百年，罗洪信在魏，刘仁恭在燕，李克用在河东，王重荣在蒲，朱宣、朱瑾在兖、郓，时溥在徐，王敬武在淄、青，杨行密在淮南，王建在蜀，天子都长安，凤翔、邠华三镇鼎立为梗，李茂贞、韩建皆尝劫迁乘舆。而朱温区区以汴、宋、亳、颍巍然中居，及其得志，乃与操等。以在德不在险为言，则操、温之德又可见矣。

【译文】



古今说地形险要的，都说秦地凭借函谷、大河的形胜，齐地仗恃大海和泰山，赵和魏国依据大河，晋国外河里山，西蜀占有剑门关、瞿塘峡的险阻，楚国用方城作城垣，汉水作城池，吴国有万里长江，并兼具着五湖的坚固，都能够建立国家。只有宋国、卫国的周围，四通八达，没有一处险要可守。然而东汉末年，袁绍占有青州、冀州、幽州以及并州四州，韩遂、马腾等分别占据着关中，刘璋凭借蜀地，刘表据有荆州，吕布窃据徐州，袁术包罗南阳、寿春，孙策攻取江东，天下的有利地形都被占据完了。曹操最后才得到兖州，在群雄间争强好胜，结果却消灭了群雄，倾覆汉室。评议的人，还以为曹操挟持皇帝，提高自己的地位，所以能成功。但唐朝僖宗、昭宗时候，藩镇割据，王氏据有赵地一百多年，罗洪信在魏地，刘仁恭在燕地，李克用在河东，王重荣在蒲州，朱宣、朱瑾在兖州、郓州，（王）时溥在徐州，王敬武在淄州、青州，杨行密在淮

南，王建在蜀地，皇帝建都长安，凤翔、邠州三镇鼎足而立，李茂贞、韩建都挟持过皇帝。然而朱温用小小的汴州、宋州、亳州、颍州几个地方，孤立地处在中间，等到他志得意满的时候，却和曹操相同。如果说兴盛是依靠德行不是依靠险要，那么曹操和朱温的德行又从哪里能看到呢？

史记世次

【原文】

《史记》所纪帝王世次，最为不可考信。且以稷、契论之，人皆帝嚳子，同仕于唐、虞，契之后为商，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，历五百余年；稷之后为周，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，历千一百余年。王季盖与汤为兄弟，而世之相去六百年，既已可疑，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，又皆暮年所生嗣君，乃合此数，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。其为漫诞不稽，无足疑者。《国语》所载太子晋之言曰：“自后稷之始基靖民，十五王而文始平之。”皆不然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史记》记载的帝王世代次序，是最经不起考证确信的。就拿稷和契来说吧！二人都是帝嚳的儿子，同时做官在唐、虞时代。契的后代是商，从契到成汤共十三代，经历了五百余年。稷的后代是周，从稷到武王，共十五代，经历了有一千一百多年。论辈分王季（文王之父）大概和商汤是兄弟，然而差了两代却相差了六百年，这已经很可疑了，那么周朝的先人十五代，必须每代在位七八十年，又都是晚年得子，

才符合此数。而他们所享的年寿，都应该超过一百岁才可以。《史记》记载的荒谬不稽，是无可怀疑的了。《国语》所载太子晋的话——“从后稷开始作为根基，安定人民，经过十五代到文王才得天下。”这些都是不对的。

乐天新居诗

【原文】

白乐天自杭州刺史分司东都，有《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》诗云：“弊宅须重葺，贫家乏羡财。桥凭州守造，树倩府寮栽。朱板新犹湿，红英暖渐开。仍期更携酒，倚槛看花来。”乃知唐世风俗尚为可喜。今人居闲，而郡守为之造桥，府寮为之栽树，必遭讥议，又肯形之篇咏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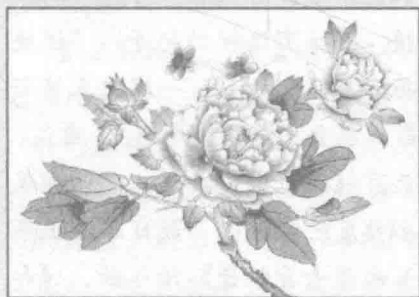
【译文】

白居易由杭州刺史调至东都洛阳任职，有一首《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》诗，诗中说道：“弊宅须重葺，贫家乏羡财。桥凭州守造，树倩府寮栽。朱板新犹湿，红英暖渐开。仍期更携酒，倚栏看花来。”从这时可以知道唐代的世风民俗还是可喜的。现在的官员离职闲居，如果太守为他造桥，府僚为他栽树，就必定要受到讥讽、议论，又哪敢写入诗中来咏诵呢！

唐重牡丹

【原文】

欧阳公《牡丹释名》云：“牡丹初不载文字，唐人如沈、宋、元、白之流，皆善咏花。当时有一花之异者，彼必形于篇什，而寂无传焉，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，但云一



丛千朵而已，亦不云其美且异也。”予按：白公集有《白牡丹》一篇十四韵，又《秦中吟》十篇，内《买花》一章，凡百言，云：“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”而《讽谕乐府》有《牡

丹芳》一篇，三百四十七字，绝道花之妖艳，至有“遂使王公与卿士，游花冠盖日相望”，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”之语。又《寄微之百韵》诗云：“唐昌玉蕊会，崇敬牡丹期。”注：“崇敬寺牡丹花，多与微之有期。”又《惜牡丹》诗云：“明朝风起应吹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。”《醉归塾屋》诗云：“数日非关王事系，牡丹花尽始归来。”元微之有《入永寿寺看牡丹》诗八韵，《和乐天秋题牡丹丛》三韵，《酬胡三咏牡丹》一绝，又有五言二绝句。许浑亦有诗云：“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窠。”徐凝云：“三条九陌花时节，万马千车看牡丹。”又云：“何人不爱牡丹花，占断城中好物华。”然则元、白未尝无诗，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。

【译文】

欧阳修《牡丹释名》说：“牡丹最初是没有文字记载的，唐人像沈铨期、宋之问、元稹、白居易等，都擅长咏花。当时有一种奇异的花，都要写入诗中，然而却没有人写牡丹。只有刘禹锡有歌咏鱼朝恩宅的牡丹诗，也只说它一丛千朵罢了，并没有夸它美丽和奇异。”我考查，白乐天集中有《白牡丹》一篇，共十四韵，《秦中吟》有十篇，其中《买花》一章，共一百字，说：“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”他的《讽谕乐府》有《牡丹芳》一篇，三百四十七字，极力称道牡丹花的妖艳。甚至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遂使王公与卿士，游花冠盖日相望”，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”。又有《寄微之百韵》诗说：“唐昌玉蕊会，崇敬牡丹期。”自注：“崇敬寺牡丹花，多与微之有期。”又有《惜牡丹》诗说：“明朝风起应吹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。”《醉归盩厔》诗说：“数日非关王事系，牡丹花尽始归来。”元微之有《入永寿寺看牡丹》诗八韵，《和乐天秋题牡丹丛》三韵，《酬胡三咏牡丹》一绝句，又有五言二绝句。许浑也有诗说：“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窠。”徐凝说：“三条九陌花时节，万马千车看牡丹。”又说：“何人不爱牡丹花，占断城中好物华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元、白并未没有写牡丹的诗，唐人也并不是不看重牡丹啊！

张良无后

【原文】

张良、陈平，皆汉祖谋臣。良之为人，非平可比也。平尝曰：“我多阴谋，道家之所禁。吾世即废矣，以吾多阴祸也。”平

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，如其言。然良之爵但能至子，去其死才十年而绝，后世不复绍封，其祸更促于平，何哉？予盖尝考之，沛公攻峽关，秦将欲连和，良曰：“不如因其懈怠击之。”公引兵大破秦军。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，既解而东归矣。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，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。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，其无后宜哉！

【译文】

张良和陈平，都是汉高祖的得力谋臣。张良的为人，并非陈平可以相比的。陈平曾经说：“我经常阴胜人，这是道家所禁忌的，所以我的后代就要灭绝了，因为我为后人种下了祸根啊！”果然，陈平传国到他的曾孙那里，便因罪而被废绝，正如他说的那样。然而张良的爵位，就只传到儿子，距他的死才十年，便被废除，后代也不再续封。张良家遭到灾祸的时间比陈平还快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曾考察过，沛公刘邦攻打峽关（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城南）时，秦国守将想要求和解，张良说：“不如趁他守备松懈的时候突然袭击。”沛公听了张良的话，打败了秦兵。项羽和汉王刘邦立约，平分天下，之后项羽就带兵东去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了。刘邦也想回关中，张良说这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，劝汉王回兵追击项羽而灭掉他。这两件事，比诛杀降兵还缺德，他没有后代也是很正常的！

周亚夫

【原文】

周亚夫距吴、楚，坚壁不出。军中夜惊，内相攻击扰乱，

至于帐下。亚夫坚卧不起。顷之，复定。吴奔壁东南陬，亚夫使备西北。已而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汉史书之，以为亚夫能持重。按，亚夫军细柳时，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文帝称其不可得而犯。今乃有军中夜惊相攻之事，安在其能持重乎？

【译文】

周亚夫抗拒吴、楚，坚守阵地，长时间不出战。军队夜间受惊，内部相互攻击造成骚乱，一直扰乱到周亚夫的帐下。周亚夫躺着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军营便安静下来。吴军攻打营垒的东南角，周亚夫命令严守西北角，一会儿吴军果然来攻西北，无功而返。



《汉书》记载此事，认为周亚夫用兵持重，稳如泰山。想当初，周亚夫驻军在细柳（今陕西咸阳西南）时，皇帝的使者率先到达，但不允许进入军营。汉文帝称赞他不可犯。现在竟有军队夜间受惊互相攻击的事情，怎么能说他用兵老成持重呢？

秦用他国人

【原文】

七国虎争天下，莫不招致四方游士。然六国所用相，皆其宗族及国人，如齐之田忌、田婴、田文，韩之公仲、公叔，赵之奉阳、平原君，魏王至以太子为相。独秦不然，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，魏人公孙鞅也。其它若楼缓赵人，张仪、魏冉、范雎皆魏人，蔡泽燕人，吕不韦韩人，李斯楚人。皆委国而听

之不疑，卒之所以兼天下者，诸人之力也。燕昭王任郭隗、剧辛、乐毅，几灭强齐，辛、毅皆赵人也。楚悼王任吴起为相，诸侯患楚之强，盖卫人也。

【译文】

七国争雄天下，没有不广泛招揽四方贤才志士的。但六国所任用的相国，都是他们的宗族和本国人，如齐国的田忌、田婴、田文，韩国的公仲、公叔，赵国的奉阳君、平原君，魏王甚至任用太子当相国。唯有秦国不是这样做的，最初与秦国商讨大计、开创霸业的是魏国人公孙鞅。其他的像楼缓是赵国人，张仪、魏冉、范雎都是魏国人，蔡泽是燕国人，吕不韦是韩国人，李斯是楚国人。秦王将重托都托付给他们但没有丝毫怀疑，所以最终就取得了天下，便是这些人的力量。燕昭王任用郭隗、剧辛、乐毅，差点灭了强盛的齐国，剧辛、乐毅却都是赵国人。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国，诸侯都惧怕楚国强起来，而吴起却是卫国人呀！

曹参赵括

【原文】

汉高祖疾甚，吕后问曰：“萧相国既死，谁令代之。”上曰：“曹参可。”萧何事惠帝，病，上问曰：“君即百岁后，谁可代君？”对曰：“知臣莫若主。”帝曰：“曹参何如？”曰：“帝得之矣。”曹参相齐，闻何薨，告舍人趣治行，吾且入相。居无何，使者果召参。赵括自少时学兵法，其父奢不能难，然不谓善，谓其母曰：“赵若必将之，破赵军者必括也。”后廉

颇与秦相持，秦应侯行千金为反间于赵，曰：“秦之所畏，独赵括耳。”赵王以括代颇将。蔺相如谏，王不听。括母上书言括不可使，王又不听。秦王闻括已为赵将，乃阴使白起代王龇遂胜赵。曹参之宜为相，高祖以为可，惠帝以为可，萧何以为可，参自以为可，故汉用之而兴。赵括之不宜为将，其父以为不可，母以为不可，大臣以为不可，秦王知之，相应侯知之，将白起知之，独赵王以为可，故用之而败。呜呼！将相安危所系，可不监哉！且秦以白起易王龇而赵乃以括代廉颇，不待于战，而胜负之形见矣。



【译文】

汉高祖病重，吕后问：“萧相国死后，有谁能接替他？”汉高祖说：“曹参可以。”萧何辅佐汉惠帝，病重时，惠帝问：“你如果不幸仙逝，谁可以接替你？”萧何回答说：“没有比陛下更了解臣子的了。”惠帝又问：“曹参怎么样？”萧何说：“皇帝已经找到最合适的人选了。”曹参当时正任齐国相国，听说萧何死了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行装，说我要入朝当丞相了。不久，朝廷使者果然来召曹参进京做丞相。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，就是他的父亲赵奢也难不倒他，但父亲不认为他学得好。赵奢对赵括的母亲说：“赵国如果一定要让他做大将，葬送赵国大军的必定是他。”其后，廉颇与秦军在长平（今山西高平县西北）对垒，秦国的应侯范雎，用一千两黄金到赵国行反间计，说：“秦国所惧怕的，只有赵括。”赵王信以为真，便用赵括代替廉颇。蔺相如强撑着

病体劝阻，赵王不听。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，说赵括不能做大将，赵王又不听。秦王听说赵括已经当了赵国的大将，于是秘密地让白起代替王龇任主将，不久便打败赵国，取得了重大胜利。曹参适合当相国，高祖认为可以胜任，所以汉朝用了他，就兴盛起来。赵括不适合做大将，他父亲知道，母亲知道，大臣知道，秦王知道，秦国的相国应侯知道，大将白起知道，只有赵王不知道，所以用了他结果遭到惨败。唉！将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，能不慎重吗？再说秦国用白起代替王龇赵国用赵括代替廉颇，所以不用等到战争开始，胜败的形势，就已经很明显了。

忠恕违道

【原文】

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忠恕违道不远。”学者疑为不同。伊川云：“《中庸》恐人不喻，乃指而示之近。”又云：“忠恕固可以贯道，子思恐人难晓，故降一等言之。”又云：“《中庸》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，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。故曰违道不远。”游定夫云：“道一而已，岂参彼此所能豫哉！此忠恕所以违道，为其未能一以贯之也。虽然，欲求入道者，莫近于此。此所以违道不远也。”杨中立云：“忠恕固未足以尽道，然而违道不远矣。”侯师圣云：“子思之忠恕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此已是违道。若圣人，则不待施诸己而不愿，然后勿施诸人也。”诸公之说大抵不同。予（切）[窃]以为道不可名言，既丽于忠恕之名，则为有迹，故曰违道。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者，故曰不

远。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。违者，违去之谓，非违畔之谓。老子曰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苏子由解云：“道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利，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丽于形，则于道有间矣。故曰几于道。然而可名之善，未有若此者。故曰上善。”其说与此略同。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孔夫子的道义，概括起来只有忠、恕二字而已。”《中庸》说：“忠、恕距离道的本源不远。”学者们怀疑这两种说法不同。伊川先生程颐说：“《中庸》的害怕别人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，才特意说忠、恕接近道的本源。”又说：“忠、恕固然可以贯穿道义，子思怕人不明白里面的意思，所以才降一等来解释。”又说：“《中庸》认为虽然曾子说过孔夫子的道义说概括起来只有忠、恕二字，但是还担心人们怀疑它不是道的本源，所以说离道不远。”游定夫说：“道的本源只有一个，岂能用比较来确定？忠、恕之所以离道本源不远，是因为它不能一以贯之。尽管如此，但是想学道的，没有比这更接近的途径了，所以说它离本源不远。”杨中立说：“忠、恕固然不足以概括全部的道，然而它距离道的本源不远了。”侯师圣说：“子思讲的忠、恕，是指加在自己身上不愿接受的，也不能加在别人身上。这就已经脱离了道的本源。如果是圣人就不会等到加给自己不愿意，而后才不加给别人。”这些人的说法不尽相同。我自以为道不应该用某上名称来说明，既然把道的本源，加上忠、恕的名称，就是有了痕迹，所以说它离开了本源。然而脱离了忠、恕二字，也就无法阐明道，所以说它距离道不远。并不是说它不足以概括道的本质。违是指离去，而不是指背叛。老子说：“最高的善就像水，水能使万物得利却不争功，停留在众人不喜欢的地方，所以说它最接近道。”苏子由解释说：“道无所不在，对什么都有利，水也是这样。然而它已有了形迹，因而和道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它近于道。然而要

找一个妥当的名称，却没有一个能超过忠、恕的，所以说最高的善就像水那样。”这种观点和我的看法基本相同。

汉采众议

【原文】

汉元帝时，珠崖反，连年不定。上与有司议大发军，待诏贾捐之建议，以为不当击。上以问丞相、御史，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，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，上从之，遂罢珠崖郡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事汉，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，请罢边备塞吏卒，以休天子人民。天子令下有司议，议者皆以为便，郎中侯应习边事，以为不可许。上问状，应对十策，有诏勿议罢边塞事。成帝时，匈奴使者欲降，下公卿议，议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。光禄大夫谷永以为不如勿受，天子从之。使者果诈也。哀帝时，单于求朝，帝欲止之，以问公卿，亦以为虚费府帑，可且勿许。单于使辞去。黄门郎扬雄上书谏，天子寤焉，召还匈奴使者，更报单于书而许之。安帝时，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，并力北边，会公卿集议，皆以为然。郎中虞诩陈三不可，乃更集四府，皆从诩议。北匈奴复强，西域诸国既绝于汉，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。邓太后召军司马班勇问之，勇以为不可，于是从勇议。顺帝时，交阯蛮叛，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，问以方略，皆议遣大将发兵赴之，议郎李固驳之，乞选刺史太守以往，四府悉从固议，岭外复平。灵帝时，凉州兵乱不解，司徒崔烈以为宜弃，诏会公卿百官议之，议郎傅燮以为不可，帝从之。此八事者，所系